

“站在高处”的谷超豪

姜泓冰

同行描述为“独特,高雅,深入,多变”,用科研界今天的说法,就是当代中国最急于寻找和培养的那类“创新型领军人才”。

回顾谷老生平成就就会发现,其中固然有天赋成分,更多却是因为早年得遇大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陈建功等名师,让他的学术生涯打下扎实的基础,一起步便站上了“世界级”的高处。

比眼界更为重要的,是精神境界与胸怀。将祖国需要与个人兴趣结合起来,是谷超豪先生面对后辈学子时一直强调的,对他们这一代人而言,为祖国需要而去攀登某个科研“高峰”,甚至不惜“转行”,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情形十分普遍。从谢希德、钱学森到谷超豪,一连串

而今闪亮在中国科研天空中的“大师”名字背后,都有着这样超越一己私利的通透理想与高远襟怀。晚年谷超豪曾经总结说,是当年的民族危亡、灾难深重的现实唤起了格外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他们只思“做大事”而不是孜孜以求地琢磨如何“做大官”、“发大财”,才让那个时代走出了日后众多领域的学术“大家”。“做学问就像下棋,要有大眼界。只经营一小块地盘,容易失去大局。”谷超豪这样概括时,今天的年轻人未必真能听懂、做到。

不完善的教育模式和科研考核体系,与只见个人眼前功利利益的眼界、精神高度,让今天的许多年轻科学家们不自觉地陷于琐屑的蝇营狗苟,怨天尤人、归咎于环境之风颇为盛行。而这样的思维和行为一旦成了习惯,学术激情、创造力便会有意无意地被扼杀、萎缩。

一个国家、社会固然不该以“集体”“大多数”为名,去剥夺、挤占普通公民的个人权益,但今天的社会精英们究竟该如何担当起对于民族命运的历史责任,而不是混同流俗、甘心成为物质欲望的乖乖俘虏,也应该是值得警醒的问题。

面对谷超豪等前辈学人渐渐远行留下的那片空白,面对钱学森的“大师”之问,需要拷问的,绝不只是教育制度,还有一个民族所有“精英”们的精神。我们需要想一想:除了“做大官”、“发大财”之外,我们是否真想“做大事”?我们该如何继承一点“站在高处,看到全局”的老式风范?

新民随笔

回不去的家园

季颖

端午节前去西北旅游,一路风光旖旎,名不虚传。赞叹之余,却因一些无法忽略的场景,横生几许感慨。

在北部边境的一处著名国家地质公园附近,有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青山绿水之间坐落着许多独特的木头房子。远眺山村的暮霭晨曦,静谧安详,如入画境。然而,漫步村内,发现沿街的木屋,都成了摆满廉价旅游纪念品的杂货铺、陈设简陋卫生堪虞的小饭店,或嘶吼之声不绝于耳的卡拉OK厅!即使在小巷深处,客栈、山庄的招牌,也不甘寂寞地探出头来……

在西部边陲的一个湖边,当地人用以往围牲畜的木栅栏把最美的一段风景圈起,进口仅留一人通过的空隙,当场付钱买“门票”方能入内。更甚的是,景区内唯一的移动厕所也是“铁将军”把门,揣着钥匙的妇女旁边守着,一元钱用一次。湛蓝的湖水,烂漫的野花,与收费者手中成摞的钞票,都令人难忘。

在大山腹地的宁静草原,传承了千百年、牛羊生生不息的牧场变身“游乐场”,牧人们争相把疲惫的老马牵到游人跟前以供驱驰,仿古的大毡房夜夜上演“国王娶亲”的歌舞宴乐。而远处,挖掘机、拖拉机恣意地撕扯着草皮,在绿色的大地上拉开一道道黑色的口子——不知是度假村还是宾馆酒店的建筑,不久将拔地而起。

其实,上述场景早已屡见不鲜。在大城小镇、在名山大川、在雪域高原,甚至在戈壁沙漠,旅游业的市场化脚步,比想象的要迅猛而执著。真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还是惋惜——没有旅游业的大发展,我们当中的多数人将没有机会领略那些美景风光。而且,旅游及其衍生产业,也是那些只有环境资源的边远地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但是,由此导致的过度开发、过度消费,绝不能小觑。这种无节制和商业化,正在给自然的生态、安宁的环境和淳朴的民风,造成永久的毁坏。

曾经的牧民之子、如今的旅游车司机乌扎,指着浅浅盖过马蹄的草皮说,小的时候,这个季节的牧草,能够长到将近一人高,多肥的草场啊。“我真想草原上那些为旅游而开的公路,都能变回原来的草场。”

只是,乌扎也清楚,他心中的那个家园,再也回不去了。

媒体视点

■ 人民日报《“理性中国”从哪里来?》:偌大一个中国,“随机抽样”如果不能覆盖发展不平衡的各区域,样本数量如果达不到科学的要求,所得出的数据就不可能反映和揭示中国的实际。失真而离奇的数据,就只会刺激着人们的情绪。(纪东冲)

■ 新华每日电讯《“舌尖”上的出版热弥漫着山寨气息》:这样一哄而上的做法,不太可能有效弘扬中华饮食文化,反倒会因为过多过滥,透支饮食文化的底蕴,令公众失去对饮食文化的鉴别力。(禾刀)

■ 中国青年报《生源抢进门,修行靠个人?》:不可否认,大学确实有很多资源,只要你是一个有心人,总能找到它们并为己所用。但在学生向内用力,反求诸己之时,大学是否可以为学生多做一点?在花了那么多资源抢到的学生身上,是否能再多投入一点,再多引导一步?(程曼祺)

新民网论

今年是聂耳100周年诞辰,但据媒体披露,公平路聂耳旧居已被列入旧区改造范围多日。6月22日,虹口区规划、文物等有关部门举行的专门会议仍然未能达成共识,尚未决定保留这一历史遗址。

旧区改造是许多普通市民热盼的,地方政府也期望通过旧区改造重塑区域城市面貌。但历史遗址是城市历史文脉所系,是更大范围人群的精神家园,合理文明的制度安排理应在决策时尽可

能包容不同群体的意愿,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以避免因决策失误,造成意料不到的后果。

音乐家聂耳是一位值得铭记的先贤,他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以一首昂扬激越的歌曲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群众对这样的音乐家是特别有感情的,对待他的故居,当然不能草率从事,如果一次专门会议达不成共识,不妨多开几次,让各方人士把各自的理由说说透,看看有没有更妥当的处置办法。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到,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许多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名人故居众多,保护工作与城市更新改造相冲突也绝非偶然。只有建立更正规的专门决策制度才能缓解此类冲突。

从预防冲突角度出发,对什么名人故居应保护,什么名人故居可以不保护,理应提前列入专门决策程序,允许社会团体、个人提出申请,由专业委员定期依法认定,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挂牌保护。而不是到了旧区改造之时,才匆忙发现矛盾冲突。

(新民网评论员,网址www.xinmin.cn)

观点圆桌

副市长举报扔垃圾怎么就不行?

新闻焦点: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湖南省株洲市城管执法支队支队长晏东方接到一条举报乱扔垃圾的短信,发信人是株洲市副市长李异建。

这就是“从身边做起”

株洲市整治乱扔乱吐启动仪式上,李异建曾经表示,“整治乱扔乱吐,要从身边做起,从公务车辆做起”。他向城管执法支队支队长举报违规行为,只是在兑现诺言。如果其视而不见,才是言行不一。

张永琪

先查清再处理

李异建“整治陋习,人人有责”的意识,值得其他市民效仿。但“副市长短信”的可信度再高,也不能据此去处理那个被举报的“违规司机”,而是要查明真相,落实证据,才能处理。

陈海荣

体现了程序正义

面对乱扔垃圾者,副市长李异建并没有采取强制的行政命令,而是通过举报的方式进行社会监督,既履行一个公职人员和公民的责任,也体现了程序正义,值得肯定。

杨朝清

自由谭

在第25个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法律界围绕“毒驾”入法问题的讨论愈发激烈,社会舆论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据统计,2011年见诸公开报道的毒驾事例就达250件,情节基本相仿,都是司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到醉酒检测被否定,而后却在车厢内发现了携带有毒品。虽然,造成严重后果的肇事司机也依法受到了处罚,但却无法对没有造成损害的毒驾行为予以刑罚处罚。

从实际情况看,司机在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上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绝不亚于醉驾和飙车。今年4月22日发生在沿江高速公路常熟段的旅游大巴撞车侧翻事故,造成了13名旅客和货车司机死亡,事后查明,司机王振伟

据市民反映,为捐一些旧衣服,普遍遇到捐助点既少又远,受捐时间不灵活,对捐赠品要求过高等问题。有些点上还要求:不是九成新的衣服不收。

杜建国 画

“毒驾入刑”问题应当正视

游伟

毒品,属于“无直接被害人”也就是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本质上无异于自伤、自残甚至自杀,其本身就没有归入犯罪行为的范围,应当更多地依靠强制治疗和严格矫治的措施予以控制。但毒驾则不同,由于毒品会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抑制作用,减慢人的呼吸频率、降低肺功能、导致人体缺氧,引发头痛、抽搐、胃肠绞痛等毒副作用,因此,极易形成公共交通安全的现实危险,后患无穷。此时,吸食、注射毒品的驾驶人员就不仅仅是一个危害自身利益的当事人,已经转化成为对社会和他人利益具有现实危害可能性的吸毒者,因此,对其毒驾行为予以司法干预就成为必

要。而且,在刑法已经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的情形下,将“毒驾”纳入刑法规范,在立法上已经有了参照和进一步推动的可能。

在当前,毒驾引发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有所攀升,社会忧虑也在增加,公安部相关负责人日前明确表示将以“零容忍”姿态全面排查包括驾驶人员吸毒在内的各类安全隐患。因此,执法部门应当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涉毒检测技术,完善查毒执法程序,为“毒驾”入法和便利、规范的司法操作积累更多的有益经验,使现行法律不断适应社会需要获得补充与完善,使社会公共交通安全得到切实、有效的保障。